

讲坛之光系列丛书

经济中国

之

改革问题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听著名经济学家演讲

邹东涛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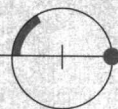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出版社
www.economyph.com

经济中国



之 改革问题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听著名经济学家演讲
邹东涛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www.economyph.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中国之改革问题 / 邹东涛主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6

(讲坛之光系列丛书)

ISBN 7-5017-6202-3

I.经… II.邹… III.经济改革-研究-中国-IV.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725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魏 民 刘 晨 (电话: 68353180 68319110)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980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47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7-6202-3/F·4983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53507 68341876 68341879 68353624



序

讲坛是现代社会的活动内容之一。从广义上说，讲坛既包括国家的或国际的各种会议论坛，也包括所有学校的讲台。讲坛是大的讲台，讲台是小的讲坛。无论是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厦讲坛，还是中国山村小学老师的讲台，都是人们传播知识、信息和智慧，表达、交流思想，纵论天下大事的重要场所。

“讲坛”二字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作为一个讲演者或教师，登上讲坛讲演或授课，既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压力。因为若要向听众和学生奉献一碗水，肚中至少要储存一桶水。演艺界“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行训也完全适用于教育界、教师和讲演者。

在世界民主化、多元化、全球化潮流的发展时代，讲坛不再是单向灌输的高地，而是双向、多向交流的场所。特别是面对当代思想解放、善于逆向思维和探根究底的青年学生，什么样的问题都可能提出来。所以，讲坛也是对讲演者、教师的考试和考验。

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在知识的膨胀率、废旧率、更新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快的时代，一般地说来，青年学生比教师对新的知识、信息和方法接受的要快得多。因此，我们的教育工作，不仅要提倡“前向学习”，即学生向老师学习；也要提倡“后向学习”，即老师向学生学习。这与中国“教学相长”的教育传统是一致的。

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而讲坛则是学校的核心。教师是通过讲坛履行传道、授业、解惑神圣使命的，而学生则是从讲坛获取知识、信息和智慧的。越是高层次的教育，讲坛发挥的作用越是重要。讲坛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尺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专门培养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的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现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68 个，硕士学位授予权 77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2 个。每学年院系共开设课程约 500 门，其中由学校统一组织开设的课程达 80 余门。

成功的讲坛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主要成果，为了把研究生院讲坛的精彩





内容贡献给社会以绘广大读者，我们特别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坛之光系列丛书”（以下简称《讲坛之光》）。首批推出的《讲坛之光——经济中国》一共五卷：其中“中国经济前沿问题”三卷，即《经济中国之发展问题》、《经济中国之改革问题》和《经济中国之财金问题》；《〈资本论〉与中国》（一卷）；《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一卷）。之所以把我们开设的讲坛称为“讲坛之光”，一是由于讲演人都是学界大家，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和专职教师，也有从北京和全国各地请来的著名专家学者，还有世界著名专家学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所谓“讲坛之光”，是这些大家们的知识和智慧之光；二是讲授的内容都是当代前沿论题，是新的问题和情况，新的战略和策略，新的思路和方法，反映了时代之光。

多年来，“中国经济”课程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众多课程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过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轨，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打造着经济中国，推进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使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各国抢摊的热点。与此同时，经济学也成了热门学科，以至于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这门课程其所以吸引人，不仅仅讲课人是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而且所讲的内容都属于前沿经济理论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实践问题。所以我们把2000年以来的讲演稿汇编成“中国经济前沿问题”三卷。

《资本论》是耗尽了马克思毕生心血的最主要的著作，没有《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伟大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國家，如果不读《资本论》，就很难说怎样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拿什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学校，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为学生开设过《资本论》课程，后来因种种原因停开了。在新的世纪开端不久，在马克思被评为“千年伟人”的时候，我们又恢复开设这门课程。可以说，马克思，久违了！《资本论》，久违了！《资本论》课程的开设大大增进了学生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功底。讲授《资本论》的教师大多是多年研究《资本论》的老专家，我们特别把所有讲演稿汇集成《〈资本论〉与中国》。

新制度经济学是近30年在世界上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一出现就受到各国经济学界的高度兴趣，成为热门研究领域，声誉日隆。因为标准





的新古典经济学很难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而现实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制度转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控制和管理等等，都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解释和指导。我们在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开设制度经济学，不仅仅是让学生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国情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实践问题，即“做中国猫，抓中国鼠”，为巩固和弘扬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小康建设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讲授这门课程的大多是中青年经济学研究者。我们特别把这些讲演稿汇集成《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

我们请到的讲课专家都十分谦虚、认真，无论讲的多么精彩，都一再谦恭地表示，讲的只是个人体会和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请大家批评指正。在这里，我们也把讲演人这个意见转达给读者。讲课记录稿整理好之后，讲演人在文字上都要下一番苦工，推敲琢磨。我们向讲演人表示衷心感谢。而编纂方面如果还存在着缺点错误，则要由我向讲演人和读者道歉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领导班子全力支持《讲坛之光》的编纂出版，许多教职工和研究生都具体参与了编纂工作。研究生院教务处的前任处长许振中教授、现任负责人杨燕同志，从 1999 年就开始编纂“中国经济”讲课稿，李胜、毛小青、邓淑娜、赵燕、张含宇、李为人等同志，都参加了编校工作。许多在校学生，如（以姓氏笔画为序）：于明清、孔欣欣、王永中、王晓光、田清旺、吕之望、吴海山、李小华、李朱、朱德武、李增刚、时红秀、冷兆松、张有国、张蓓、郑任钊、秦治来、韩建军等同学在整理讲课录音稿、编辑、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本书收入的讲演人照片，除少数是由讲演人自己提供的，其余均由黄晓洪同志现场拍摄。中国经济出版社的魏民、刘晨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魏民同志在四年前就着手整理编辑中国经济讲座的资料，费了较长时间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愿《讲坛之光》能为中国的学术繁荣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丝光亮。

邹东涛

2004 年 8 月



目
录

- 张卓元
- 1 新世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
- 董辅初
- 17 十六大以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
※
- 李剑阁
- 31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
- 宋晓梧
- 45 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考
※
- 邹东涛
- 61 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 左大培
- 73 关于公有财产代管人制度的设计过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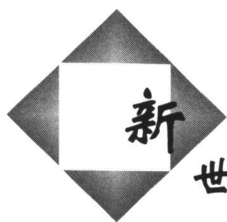
- 95 周天勇
从经济发展角度冷静地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
※
- 131 李晓西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三大推动力
※
- 143 党国英
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163 王延中
中国的就业形势与失业问题
※
- 181 史鹤凌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巨大挑战
※
- 189 邹东涛
劳动价值论：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
- 219 蔡继明
价值理论创新与第四次思想解放
※
- 229 岳福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推进经济理论创新
※



- 247 邹东涛
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兼谈中国“海归派”和“本土派”
※
- 257 王振中
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现状
※
- 273 蔡 昉
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
※
- 291 钱颖一
经济学科在美国与美国的经济学家市场
※
- 327 霍建国
加入WTO后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应对措施
※
- 343 李京文
加入WTO之后中国产业技术的发展趋势
※
- 361 杨 帆
关于加入WTO的非主流视角
※
- 371 金 碚
WTO规则下的中国工业经济
※



- 387 马晓河
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影响
※
- 399 罗肇鸿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加入WTO的战略选择
※
- 409 郭克莎
加入WTO对中国工业的综合性影响
※



世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讲演人: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卓元

1933年7月生，广东省梅县人。1954年7月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并先后担任财贸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和《财贸经济》、《经济研究》主编。

主要业务专长：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市场学。

主要社会兼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价格学会、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物资流通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1984、1986、1988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1983）、《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1987）、《张卓元选集》（1987）、《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1988）、《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1995）、《论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化改革》（1995）、《新价格模式的建立与市场发育的关系》（1996）、《面对发展之春》（1999）、《政治经济学大辞典》（主编，1998）。





新世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①

张卓元

同学们：

今天我很高兴到这儿给大家讲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一些重要问题，因为我本人这几年比较多地从事政策方面的研究，包括参与一些中央文件的起草，所以对一些现实问题接触的比较多，而对一些比较基础的理论问题最近接触的比较少，所以，今天我想趁这个机会就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几个重要的问题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今天我着重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三农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第三是关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第四是关于分配，包括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国民经济最突出的问题，上上下下都很关心，怎样解决，各个方面都在探索。这里，我想提出一个从长远来看，从根本上来看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走出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目前很多同志都认识到，要跳出三农的圈子，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光从农业那里找出路是很难根本解决问题的。因为农业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就业，现在农村的劳动力有 3.5 亿，而从我们现在的耕地情况来看，有一两亿左右的农业劳动力就够了，而且现在的产出太少，从前年和去年的数据来看，我们占 50% 的劳动力提供的 GDP 只有 16%，所以大家都说要从根本上增加

^① 本文为张卓元教授于 2002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做的讲演。





农民的收入，就要减少农民，也就是只有改变目前二元经济结构的局面，实现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国家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就是其经济结构是二元的，一方面存在城市的现代工业，另外一方面农村是落后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

发展中国家要摆脱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状态，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就要通过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城市化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的状态，形成现代经济结构来实现现代化。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就是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到现在为止，无论是老牌的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都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走出来的。摆脱发展中状态走向发达的道路，都是走的这条路，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很重要，因为从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都要走这一条路。关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也觉得中国只能走这条道路，所以，我们要解决三农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的核心是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第三产业，只有从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的角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才能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有足够的高度，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部门或者是一个产业的问题，而是属于全局性的问题。

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也不能只局限于农业部门本身，比如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这个当然很重要，包括通过税费改革，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像这些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远远不是全部，而是应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从实现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也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出发做出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安排。

1995年我们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很响亮、影响深远的口号，就是大家记得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也就是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这个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现在应当进一步提出比上述两个根本转变还要更加根本、更加高层次的转变，也就是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前两步。在新的世纪，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我们在中央十五计划建议里已经提出来了，三农问题也要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得到根本解决。

因此，只有到了从总体上提出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现代经济结构口



号和战略方针的时候，才能够使大家更加重视和采取更为有利的措施，发展非农产业，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国家目前的城市化率大体是 37%，相对于工业化来说是比较滞后的，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将近 45%。为了更快地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的状态，看来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推进城市化，使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我国的一般消费品已经是供给大于有购买力的需求，因此多一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第三产业，没有大风险，因为我们整个的供给，特别是农产品和工业消费品的供给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加快城市化应该引起全国上下的重视。我们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去年是 63%，要使农村人口的比重低于 50%，城市化首先就是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要超出 50%，这样的话还要增加十三四个百分点，如果一年减少一个百分点也要十三四年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看，1978 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 18%，2001 年是 37%，也就是说改革开放 23 年来，城市人口的比重提高了 19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 0.85 个百分点，今后城市人口的比重每年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要比过去 23 年还要高一点，这个转移的比重才能够实现。由此看来，我们也许要到 2015 年，最迟到 2020 年才能够开始实现城市人口占比较大的比重，初步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的状态。

而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国工业化才能够走出中期阶段，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一般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要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是根据国家计委的预测，也是多数部门同意的观点。当然也可以做进一步研究，因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些专家认为中国现在的工业化还处于初期阶段，他们主要是根据钱纳里的公式来算，不赞成已处于中期阶段，但是现在有关经济部门，以及多数我接触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业化处在中期阶段。现在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也是以这个为出发点，就是我们现在工业化处在中期阶段，整体到 2020 年基本上实现工业化。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工业化已经不是传统的工业化了，而是在信息化带动下的工业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有的人提出了叫新型的工业化。新型的跟传统的区别有四条：科技进步明显，资源消耗比较少，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比较低，整个的经济效果比较好。因此，我们现在要实现的工业化应该是这种新型的工业化。而且，我们可以将实现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



代经济结构的转变作为新世纪前 20 年的战略任务，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今后 20 年，对中国来说，最紧迫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央十五计划建议也提出过这个问题。

为了顺利实现上述结构转变，就要逐步取消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种种限制，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包括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等。中外的经济实践表明，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劳动力流动性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经济就比较活跃、发展比较快。我们国家广东、浙江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劳动力的流动是好事不是坏事，要积极引导，我们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的流动、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我们要努力促使其健康发展。我国要大力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充分发挥城市的效应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城，为了更好地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要节约用地，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应该多发展中小城市，避免过多过滥地发展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问题，也还有较多不同意见的争论。开始，特别是一些负责同志，都做过大城市的市长，他们听说大批的农民工要进城，根据过去的经验都觉得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农民工进城首先会带来社会的治安问题，还有城市的管理等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如果是几百万的农民要进城的话，进大城市的话，怕城市招架不住，所以，中国要不要实行城市化在我们一些同志那里，也是打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因此，过去较强调发展小城镇，提升城镇化这个概念，到现在，在中央文件上一般写城镇化，城市化上不去。

为什么写城镇化呢？就是说发展小城镇还可以。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大城市的发展采取控制的态度，怕大城市大量的农民工涌进来以后很难管理，而且都希望把大量的农民稳定在农村，城市自己来发展。可是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世界各国摆脱不发达状态这个规律的。发展小城镇也有问题。有的省的意见就不赞成过多地发展小城镇，因为发展小城镇占的耕地太多，而且城市的集聚效应发挥不出来。同志们可以研究一下，在中国，只有像 50 万、150 万的城市，其功能和集聚效应才能充分地发挥，所以，他们主张发展大中城市。因此，这个认识要有个过程。我觉得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几乎我所接触到的经济学家都主张用城市化来代替原来城镇化的提法，其实英文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是一个词，因为城市化的概念比较准确，城市化可以使得不要认为将来农民只进小城镇，而不能进大中城市，城市化意味着不要光是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而是有条件的大城市、中小城市都可以发展，当然小城镇也可以发展。也许现在看来，最后



的制约不是限制农民工进城的管理，现在最后的制约可能是水资源，如果没有水的话，大城市很难发展，除了北京，北京可以调全国的水来供应，像天津，它的城市规模太大的话，也许前途堪虞，相反我们南方一些地方水资源比较充分，也许将来城市的规模可以大一点。将来也许我们大城市的发展，水资源的制约可能是一个硬约束，除了这个以外，过去一些体制方面、认识方面的障碍应该逐步地破除。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是今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将会决定着整个改革的进程，三年脱困，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目标实现了，但是脱困目标实现以后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的问题就基本得到解决，或者它的改革任务就好像没有那么大，其实不是这样。这是因为：

首先，脱困不是一个属于改革方面的内容，主要就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亏损，大部分不再亏损，扭亏为赢这叫脱困。而且，脱困的范围定的是很窄的，一万七千多个企业的范围内 6599 户亏损企业脱困，这个一万七千多个企业只是国有企业的一小部分，还不到 1/10，六千多户更是全部国有亏损企业的十几分之一，因为一直到去年我们还有九万多户国有企业是亏损的，这个指的是大中型企业，而不是所有的企业，所以，原来定的那个改革脱困的范围是有限的、比较窄的范围，主要是大中型企业，骨干部分，所以大部分的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

其次，国有企业改革还有两个方面的任务。第一个就是大批的中小企业退出，要退出市场。去年根据财政部的统计，我们的国有企业还有 19.1 万个，其中有一半是亏损的企业，而且许多是资不抵债的企业。如果按照原来设想的将来中国的国有企业究竟还留多少，当时比较普遍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好，都认为，将来也许我们保留国有企业也就是几百个，都是大型、特大型的企业和企业集团，而 2000 年还有近二十万个国有企业，也就是说要保留只是一个小小的零头，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要逐步退出，当然我们里头的几百家是大家伙，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但留的也不是说都是搞国有独资，今后恐怕 90% 以上是国家控股，要走股份制的道路。

所以，现在需要大批的中小企业退出，一些大企业也要退出，但是由

